

義大利漢學研究的現況——從歷史觀點*

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of Italian Sinology: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

圖莉安 (Antonella Tulli) **

一、引言

「義大利的漢學研究，在歐洲是最古老、同時也是最年輕的。」¹為證明義大利漢學的歷史悠久，必須要回溯到兩位義大利耶穌會士，利瑪竇 (Matteo Ricci, 1552-1610) 及衛匡國 (Martino Martini, 1614-1661)。義大利漢學研究機構的成立也是由來已久，早在 1732 年，馬國賢神父 (Matteo Ripa, 1682-1746) 就在拿波里創辦了中國學院，這是義大利最早的中國研究中心，後來改為皇家亞洲學院 (1868-1888)，最後則改成拿波里東方皇家學院。義大利的首堂大學中文講座，則一直要等到 19 世紀末，才由專攻遠東語文學及宗教的學者賽維理尼 (Antelmo Severini) 於佛羅倫斯 (皇家高等研究院) 開設，因此比起其他歐洲國家可謂起步較晚。² 19 世紀時，比利時與荷蘭的漢學研究正值興盛期；到了 19 世紀末，在德國的幾所大學也有同樣的盛況。而義大利的漢學研究，一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幾年，才真正稱得上是再度復甦、推廣開來。

多年以來，漢學一詞在西方指的是中國及中國文明相關，內容廣泛的跨學科研究。儘管眾說紛紜，不過目前的趨勢，似乎是將其定義侷限在語文學研究上，馬可波羅並不懂中文，因此我們無法把義大利漢學研究回溯至馬可波羅開始。³ 儘管《馬可波羅遊記》是當時最早

對中國文化有所著墨的，但他筆下所描述的，是個廣闊、富裕、強盛的大中國形象，卻不偏重於解釋中國如何能達到如此高度的文明。在他之前的遠古時期，雙方接觸更是微乎其微，而中古時期，除了馬可波羅這樣的商人外，方濟會傳教士也冒險遠渡重洋來到中國，不過因為他們汲汲於宗教工作，所以對傳播中國文明的貢獻不大。

二、義大利漢學研究的歷史脈絡 (從 16 世紀末到 1950 年)

歐洲方面對中國的探索，是起源於葡萄牙人到達廣州，耶穌會士抵達北京之時。這段歷史多半歸功於傳教士——特別是耶穌會士利瑪竇及德禮賢，本段所述及約三百多年的歷史，剛好可以這兩人作為起始與終點。傳教士本意在改變中國人的信仰，他們受此限制，多半會忽略較文學性的作品，僅著眼於哲學或史地；又因他們還得尋求教會高層階級、政府或歐洲知識份子的必要支持，才能繼續在遠東的傳教活動，因而成為西方與中國世界相互認識的最佳橋樑，把截至當時西方文化科學最好的一面介紹給中國，也憑著其博學多聞，首度把中國文明以有系統而科學的方式，揭露在西方大眾面前。這些傳教士選擇上朝拜見天子的方式，注定了他們的成

* 本文為筆者承接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報告，首次發表於 2004 年 10 月，此為原文刪修後的版本，由蔡雅菁翻譯，許元真修編。

** 作者為輔仁大學義大利語文學系助理教授。

1 Lionello Lanciotti, "Breve storia della sinologia. Tendenze e considerazioni," in *Mondo Cinese*, 23 (1977), pp. 3-12.

2 雷慕沙 (Abel Rémusat) 於 1814 年就在巴黎首開大學中文講座課程 (開設於法蘭西學院)；英國則是在 1876 年 (牛津與劍橋) 與 1877 年 (倫敦) 間首度開設中文課。

3 Giuliano Bertuccioli, "Gli studi sinologici in Italia dal 1600 al 1950," in *Mondo Cinese*, 81 (1993), p. 10.

功。中國朝廷的文明、組織深令傳教士著迷：由繁複嚴苛的科舉制度所挑選出的官員與文人管理整個帝國，地位崇高，僅臣服於唯一的天子之下。但學識淵博的耶穌會士同樣經過嚴格訓練，並服膺於其領導者教宗，展現出與朝臣不相上下的能力。這些傳教士兼備人文素養與科學訓練，立即在數學與天文學等學科，展現出高人一等的造詣，一如他們在幾何學、地理、水利、西方歷史與道德上的表現，而幾何學等知識在以農立國的中國更受關切。正是因他們知識卓越，又深諳如何「以科技創新作為傳播天主教的『名片』⁴」，才立即受到歡迎與尊崇，成為深受仰重的西方特使。因此文藝復興末期耶穌會士的重要，可分兩方面來探討：一方面是將許多學術知識翻譯並以中文出版——尤其是歐洲科技方面，這多虧了改信天主的官員協助；另一方面，則是將中國文明各面向（歷史、地理、道德倫理）的資料加以翻譯，並以拉丁文出版。

（一）傳教式漢學⁵

耶穌會士早期針對儒家典籍的拉丁文翻譯，⁶可回溯到16世紀末葉，主要的功臣是利瑪竇與羅明堅（Michele Ruggieri, 1543-1607）。⁷而艾儒略（Giulio Aleni, 1582-1649）則致力於以中文描述並介紹西方地理及科學，以供中國人使用。

利瑪竇在北京待了近半輩子共28年時間，死時留下了約2,500位信徒，如果算算當時的歐洲傳教士只有8人，就可知他成功使人改信天主的紀錄相當驚人。他對後代充滿責任感，也想把自己在中國所學所見所聞都留給後世作見證，因為眼見身邊的會友一個個凋零了，於是在他與世長辭前三年，著手完成了一部論述中國地理、歷史、哲學、宗教、國家組織與風俗習慣的著作。該作品的手稿多年來被埋沒在羅馬耶穌會的檔案室中，1613年由比利時的耶穌會士金尼閣（Nicholas Trigault）將此書譯成拉丁文；其版本雖與義大利原文頗有出入，卻讓此書終於能為人所認識。⁸此譯本於1615年出版，曾多次重刷，而義大利文版也於1911-1913年⁹及1942-1949年¹⁰時出版，1953年的英譯版本則是根據拉丁文譯本。¹¹義大利文的初版還收錄了利瑪竇的信函，不過註記不多，因為編者本身並非漢學家。第二版則由德禮賢所編，補充了許多旁徵博引的註解，無奈出版時卻又被任意修改過，所以連書名都更動了。¹²利瑪竇在他的《交友論》（*De Amicitia*, 1603）中也曾引介些許西方哲學的概論。

衛匡國26歲時就前往中國，於1643年途經上海時，年長的會友潘國光（Francesco Brancati）開始引領他研讀文言文。當時明朝政權岌岌可危，1644年已攻陷南京，1645年又佔據杭州。1651年他帶著一位中國青年

4 文錚，“Matteo Ricci e l'introduzione degli 'studi occidentali in oriente'. Le vicende relative alla composizione ed alla pubblicazione della sua grande opera storiografica: I commentari della Cina,” in *Rinascimento italiano: storia e attualità*, 2001年9月於北京舉行的研討會專刊，由中國義大利文學研究協會、大連藝術學院及義大利大使館文化處主辦。

5 以下所參考的文章，包括 Giuliano Bertuccioli, “Gli studi sinologici in Italia dal 1600 al 1950,” in *Mondo Cinese*, 81 (1993), pp. 3-22; Federico Masini, “Italian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iterature,” Viviane Alleton & Michael Lackner ed. *De l'un au multiple, Traductions du Chinois vers les langues européenne.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into European languages*, Paris 1999, pp. 33-57; Giuliano Bertuccioli, “Il volto della Cina fatto conoscere da Martino Martini nel XVII secolo,” in *Mondo Cinese*, 104 (2000)。

6 參見 K.Lundbaek, “The first translations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in Europe,” in *China Mission Studies (1550-1800) Bulletin*, I, 1979, pp. 1-11.

7 Ruggieri 翻譯《大學》的第一部，收錄在 Antonii Possevini, *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diorum in historia, in disciplinis, in salute omnium procuranda*, Roma 1593.

8 N. Trigault, *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s Jesu*, Augusta 1615.

9 P. Tacchi Venturi (ed.), *Opere storiche del P. Matteo Ricci S.I.*, Macerata 1911-13, vv. 2.

10 P. D'Elia (ed.), *Fonti Ricciane*, Roma 1942-49, vv. 3.

11 L. Gallagher, “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,” *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-1610*, New York 1953.

12 從《論耶穌會與基督教傳入中國》（*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e Cristianità nella Cina*）改為《基督教引進中國史》（*Storia della 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*）。

書僮（身兼秘書、傭人、字典），展開一場長達一年半的旅程，因此他得以在同伴協助下，閱讀隨船攜帶的眾多中文文獻，並著手寫作。1653 年底衛匡國在挪威下船，1654 年時經由德國抵達荷蘭，一群急於瞭解中國一切的學者熱情地接待他。於是為了滿足這些學者的要求，他編纂了西方第一本《漢語文法》（*Grammatica Sinica*，因無法印出中文字體而未曾出版¹³），這對歐洲北部的漢學研究是一大里程碑。1654 年他在安特沃普出版頗受好評的《論韃靼之戰》（*De Bello Tartarico*），這是以親身體驗漢滿衝突而寫成的第一本類似「新聞報導」的作品。同年他又運用精確地圖學在阿姆斯特丹出版《新中國地圖集》（*Novus Atlas Sinensis*），這是第一部有關中國（以及日本）地理的著作——內含 17 張各省地圖，鉅細靡遺地記錄了風土民情與各省份納貢情形等資料。另一部作品為《中國遠古史》（*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*），循李維《羅馬史》的模式，寫中國到耶穌誕生前古代史。1655 年他在天主教宗法院上發表一篇介紹中國禮儀的回憶錄，¹⁴又在羅馬積極尋求補助與援助，以便能繼續於中國傳教，期間還在中國開辦神學院，以培訓中國未來的神職人員。衛匡國亦著有《求友篇》（*De Amicitia*）一書，大量引用拉丁文與希臘文，以西方經典文學選集的形式，廣為宣揚西塞羅、塞內嘉、柏拉圖等人曾論及的主題。¹⁵之後 1662 年殷鐸澤（Prospero Intorcetta, 1625-1696）又與另一會友於江西省的建昌重新出版《大學》及部分的《論語》，¹⁶1667 年又在廣州、1669 年在印度出版《中庸》。¹⁷最後殷鐸澤和另外三位耶穌會士於 1687 年在巴黎出版《中國哲學家孔子》，¹⁸為歐洲讀者介紹孔子的教誨，並完整翻譯《論語》，還附上

孔子的小傳及一篇談中國古典文學與儒家思想的描述。

義大利對西方漢學研究的貢獻，還包括第一本中文拉丁文字典的編纂，這是方濟會士葉尊孝（Basilio Brolo da Gemona, 1648-1704），分別於 1694 年及 1699 年於南京發行。但出版費高昂，因此一直以手抄本形式流通，直到 1808 年法國政府才決定發行字典，於是 1813 年，曾任法國駐廣州領事的小德金（C. I. Joseph de Guignes, 1789-1845），僅以他自己的名字出版了一本相當別緻的版本，¹⁹然而其內容多半是根據葉尊孝收藏在梵諦岡圖書館的手抄本。他的抄襲後來被雷慕沙和柯恆儒（J. Klaproth）所發現。

另一本較完備的字典，是由耶穌會士晁德蒞（Angelo Zottoli, 1826-1902）所籌劃，卻從未付梓。白佐良（Giuseppe Bertuccioli, 1923-2001）提到：「依據 H. Cordier 所述，字典 1907 年還在印刷階段，而瓦卡（Giovanni Vacca）卻寫道，該字典共有 12 冊，分成四個手抄本，1913 年保存於上海耶穌會徐家匯藏書樓中等待印行。希望這些稿件沒有散佚，還跟其他耶穌會士所收藏、1950 年後就收藏在上海市立圖書館的圖書在一起。」白佐良還提到，該字典補全了晁德蒞稍早於 1878 至 1882 年間，以 5 冊發行的《中國文學選集》，²⁰這是 1950 年前，以西方語言翻譯中國古典文學最大的選集。不過拉丁文版本價值不高，因此上海的耶穌會士只以法文出版了第 1 冊。

（二）世俗式漢學

在白佐良對義大利漢學的重建工作中，從 17 世紀耶穌會士達到的成就之後，一直到德禮賢（名列 20 年代主要的漢學家之一，也曾是白佐良的老師）為止，整

13 之後在《作品全集》（*Opera Omnia*）的第 2 冊才出版，手抄本藏於 Glasgow 圖書館，最為接近原文，可能已遺失。

14 正因衛匡國的言論，教皇亞利桑卓七世於 1656 年 3 月 23 日頒布諭令，為耶穌會士的《論中國禮儀問題》論文背書。

15 以原文及義大利譯本出版衛匡國的《作品全集》5 冊，是 M. Martini 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之一。許多機構都對這個中心的創建有貢獻。馬西尼教授就提到，當白佐良教授躺在醫院病床上時，仍繼續編輯第 3 冊。

16 P. Intorcetta, *Sapientia Sinica*, Kien chan in urbe Sinarum Provinciae Kiam Si, 1662.

17 P. Intorcetta, *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-Moralis*, Quam-Chou 1667, Goa, 1669.

18 *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* (Prosperi Intorcetta, Christiani Herdrich, Francisci Rougemont, Philippi Couplet), Paris, 1687.

19 J. De Guignes, *Dictionnaire chinois, français et latin*, Paris, 1813, pp. LVI-1114.

20 A. Zottoli, *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*, Tou-sé-wè, vv. 1-5, 1878-1882.

個 19 世紀除了晁德蒞的字典與《中國文學選集》外，進展可謂一片空白。至少在白佐良所劃分的「傳教式漢學」(Sinologia Missionaria)與「世俗式漢學」(Sinologia Laica)之間，傳教式漢學的情形是如此。而其原因，可能是義大利的政治情況特殊，直到 1870 年才完成統一，因此義大利對遠東的興趣，是很晚以後才發展出來的。

在這段義大利空窗期間，巴黎的法國學院於 1814 年 12 月 11 日首度由雷慕沙 (Abel Rémusat, 1788-1832) 開辦「中國暨韃靼滿州語言文學」講座，後又由他的得意門生儒蓮 (Stanislas Julien, 1797-1873) 續開，歐洲的現代漢學研究遂在法國應運而生。這種新興的世俗式學院派漢學似乎有個特色是：除了少數幾人外，多數人很難駕馭中文口語，而先前提過的「傳教式漢學」，卻最以口語能力為傲，因為他們藉教會等國際機構之便，能長期居留傳教，故對中國的知識有第一手的了解。儒蓮的學生之中有安德羅齊 (Alfonso Andreozzi, 1821-1894) 和賽維理尼 (Antelmo Severini, 1828-1909) 兩位義大利人，兩人皆追隨其師腳步，研究中國白話文學，這個主題是傳教士學者們所未曾觸及的。《水滸傳》的第一本西方語言譯本是安德羅齊的作品，聲譽卓著的權威 Arthur Waley 亦曾極力加以褒揚。安德羅齊在漢學研究上雖顯得卓越非凡，佛羅倫斯皇家高等研究院的第一個「遠東語言」講座，卻由賽維理尼擔任，他主要翻譯日本文學。他死後的接班人是普意尼 (Carlo Puini, 1839-1924)，兩人不同的是，普意尼在中文文學或介紹中國古代政治司法制度的作品翻譯上，都相當多產；包括了 1872 年發行《改編自明《龍圖公案》的七個短篇》(Novelle cinesi tolte dal Long-tu-kung-ngan)，以及《禮記》第 23、24 及 25 篇。

1866 年義大利政府與中國重建外交關係，派遣 Vit-

torio Alminjon 指揮 Magenta 巡洋艦簽訂通商條約，在條約中雙方對「一、勿丫、力一、」國名達成協議，第一個音節排除使用「夷」字（主要意思為野蠻人），雖然意念的「意」後來也以正義的「義」代替。²¹由於當時清朝不允許中國人服事外國勢力，在向法國、英國借用了幾年口譯人員後，深感不便，於是在上海設立實習口譯員一職。諾全提尼 (Lodovico Nocentini, 1849-1910) 是第一個有機會以「實習口譯員」身分到中國住過的義大利教授，他 1883 年被派駐到上海領事館，5 年後回到義大利，繼續擔任羅馬大學中文教授。諾全提尼的學生威達雷男爵 (Guido Amedeo Vitale di Pontagio, 1872-1918) 取代了他在北京公使館的位置，他的中文發音幾近完美，正由於他在語言學方面的這項才能，頗受大使 Daniele Varé²² 賞識，如大使在書中所述，慈禧太后也非常欣賞他，²³ 中國人亦對他讚譽有加，1917 年語言改革活動開始，胡適與其他改革者就是從威達雷所出版的 *Chinese Folklore-Pekinese Rhymes* (1896) 與 *A First Reading Book for Students of Colloquial Chinese-Chinese Merry Tales* (1901) 兩本書中擷取靈感。

另外，曾在中國擔任領事的拿波里東方學院畢業生有福羅秘車利 (Eugenio Felice Maria Zanon Volpicelli, 1856-1936) 及羅斯 (Giuseppe Ros, 1883-1948)，福羅秘車利於 1899 年任香港總領事，在那裡發表不少漢學研究的論文和專書，也頗自豪能將貝卡理亞 (Cesare Beccaria) 的《論罪與罰》(*Dei delitti e delle pene*) 第三章譯成中文並自掏腰包出版，他相信這使中國廢除了審判中的酷刑惡習。羅斯於 1921 至 1924 年擔任漢口的領事，1936 年起調到廣州。他是個超級愛書迷，一生中有兩個收藏豐富的圖書館：第一個被北京大都會圖書館買下；第二個圖書館於 1943 年被日本人沒收，在運往日本途中，船被美國潛水艇擊中而沉沒。

21 *Trattato di amicizia, di commercio e di navigazione tra S. M. il Re d'Italia e S. M. l'Imperatore della Cina* 條約的內容是在 1866 年決定，但義大利國會 1868 年 5 月 24 日才核准，並於同年頒布：參見 *Collezione celerifera delle leggi, dei decreti e delle istruzioni e circolari*, a. XLVII, pt. Ia 1868, pp. 833-845。現在中國大陸用「意大利」，臺灣則用「義大利」(Michele Fatica 教授的註腳，*L'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 come sede di scambio culturale tra Cina e Italia nei secoli XVIII e XIX*, p. 23)。

22 Daniele Varé (1880-1956) 1912 年到 1920 年、1927 年到 1931 年間在北京任職，1932 年離職。著有 *Laughing Diplomat*, Londra 1938。

23 他威達雷男爵和 Sercey 公爵合寫的《蒙古語文法及字典》(*Grammaire et vocabulaire de la langue mongole, dialects des Khalkhas*) 也應證其學術地位，這本書是在 1897 年以北唐遣使會修士的印刷字模於北京出版。1899 年 3 月，他獲法國政府授勳「銀棕櫚」(delle palme di argento)，並命為「學院騎士」(ufficiale di accademia)。

(三) 一個特例：拿波里中國學院的角色及其在歐洲之重要性

中國學院 (Collegio dei Cinesi) 是歐洲漢學研究歷史上的先驅，對中國語言與文化而言，都是一個重要指標，也是現在拿波里東方大學的前身。²⁴ 中國學院在馬國賢神父的推動下，1732年4月7日於拿波里正式核准成立，定名為基督聖家會學院 (Collegio della Congregazione della Sacra Famiglia di Gesù Cristo)，以培育年輕的寄宿生為目的。其前身為馬國賢神父 1715 年 6 月於中國成立的神學院，旨在依據羅馬正統培育中國傳教士，後於 1724 年 11 月遷到拿波里。

根據馬國賢的初步構想，學院同時也是歐洲青年們自費的住宿學校，讓他們能完成學業以取得神職，又同時可學習中文，有的教士及樞機主教寄住於此就只為了學中文。由於這是當時在歐洲獨一無二的機構，就連英國大使馬戛爾尼 (George Macartney) 及斯當東 (George Leonard Staunton) 在準備到中國的派遣任務時 (1793-1794)²⁵ 也要向學院求助。此外在 18 世紀，全歐洲及拿波里的貴族，對中國世界與中國文化一直有強烈憧憬，這一點只要從當時大受歡迎的中國風 (*chinoiseries*) 品味就可得知。

學院的功勞似乎也包括提供鑄模與活字印刷，以出版小德金的第一本中拉法文字典。拿破崙一世亦曾向該學院訂購字模。在拿破崙當政的法國十年 (1806-1815) 期間，學院從 1812 年起隸屬於公共教育管理處 (Dire-

zione Generale dell'Istruzione Pubblica)，體制等同於義大利南部的高中階段，除了開設文法、修辭、希臘文、歷史、地理、幾何學與哲學課程，也提供包括中文在內的外語課程，就讀的義大利青年人數越來越多。這是四年制自費的課程，1809 年人數達到 40 人，其中學生多半來自貴族家庭。

在此環境下，1813 年不同於以往的拉丁文及手抄本形式，第一本以義大利文寫成且有中文字印刷的中文文法書問世。這本《拿波里中國學院專業學校專用中文文法書》 (*Grammatica cinese fatta per uso della Scuola Speciale installata nel Collegio de' Cinesi in Napoli*) 的作者是 Gennaro Filomeno Maria Terres，中文副標題為「中國字」。

第二次鴉片戰爭 (1856-1860) 與北京會議 (1860) 結束後，法國取得在中國自由宣教之權，於是中國學院對教廷幾乎派不上用場。但是對剛統一的義大利王國來說，傳教士對文化與其後的商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，也提高了學院的重要性。於是在 1868-1888 的二十年間，中國學院更名為皇家亞洲學院 (Real Collegio Asiatico)。改頭換面的新學院為了擴充義大利在東方的影響，在原本的中國學院外，又發展了新的非宗教部門，幾乎全由非神職的教員所掌管，並開放給對商業有興趣的年輕人，命名為「活的東方語言」組。新開設的課程有：蒙文、俄文、英文、中文。義大利王國和中國恢復外交關係後，皇家亞洲學院的角色更加重要，此外像郭棟臣與王佐才²⁶ 等幾位優秀的中國教士與教授，當然

24 在這方面，我們要感謝拿波里大學哲學與政治教授梵第卡 (Michele Fatica) 提供資料，他在這方面作過不少歷史研究。其中本文曾參考的有：Michele Fatica, "L'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 come sede di scambio culturale tra Cina e Italia nei secoli XVIII e XIX," in *Scrittura di Storia*, Quaderno n. 2-maggio, pp. 83-121; Michele Fatica, "Per una mostra fotografica ed iconografica su Matteo Ripa, il Collegio dei Cinesi e il Real Collegio Asiatico (1682-1888)," in M. Fatica, F. D'Arelli ed., *La missione cattolica in Cina tra i secoli XVIII-XIX,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*. 「1997 年 2 月 11-12 日拿波里國際研討會」, Napoli 1999, pp. 1-38.

25 Michele Fatica, "Gli alunni del Collegium Sinicum di Napoli, la missione Macartney presso l'imperatore Qianlong e la richiesta di libertà di culto per i cristiani cinesi 1792-1793," in S. Carletti, P. Santangelo, M. Sacchetti, *Studi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*, vol. II, Napoli 1996, pp. 525-566.

26 郭棟臣 (字松柏, Giuseppe Maria Guo) 和王佐才 (字化南, Francesco Saverio Wang) 與另外三位神學院青年，是從湖北於 1861 年 12 月 31 日到達拿波里，郭到達時才 15 歲，而王才 19 歲。他們在 1872 年 9 月 22 日就被授與神職，打破了中國人要滿 30 歲才能授職的規定。兩人都天資聰穎且博學多聞。郭松柏 1869 年就用義大利文出版一本中國語言與文化的初學教材，王佐才會寫過一本跟郭的書用意完全迥異的小冊子，盡力把自己限制在教導義大利青年中文基礎會話，而沒教導他們中國字，也就是只以拼音方式教學。

功不可沒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1885年在拿波里，中文教學甚至開始於中學階段（於 Salita Tarsia 技術海事學院開設），課程由王佐才的門生 Edoardo Vitale 負責，他在 1888 年發行了可謂是第一本義大利文、且在義大利撰寫及出版的中文文法書，名為《中文文法——附範文、閱讀、小字典及 214 個部首表》（*Grammatica cinese con temi, letture e piccolo vocabolario nonché tavola delle 214 chiavi*），此外考入大清海關兩個名額的錄取者都是該所學校畢業（如前文提到的福羅秘車利），加上義大利與中國初建外交關係時，所雇用的傑出口譯官有不少是在該校受訓，可稱得上是拿波里的知名機構。

三、義大利漢學的現況

（一）義大利一般漢學研究的現況

如之前所述，從二次大戰後，義大利的漢學研究在新基礎上，歷經一段興盛或復甦期，學院負責人如白佐良與蘭契奧蒂（Lionello Lanciotti）教授居功甚偉。致使新一代的義大利漢學家皆訓練完備，並在成為教授後，又得見學生及中文愛好者，因為渴望超越以歐洲為中心的文化觀念，人數逐年增加的盛況。而學術機構一旦瞭解學習中文或其他亞洲語文，不僅是對異國風味的過分熱情，而有其實際的文化需求，也積極加以推動。70 年代起隨著義大利與中國重建外交關係，及義大利 1968 年與 1977 年的學生運動風潮，學生人數倍增。蘭契奧蒂表示，威尼斯大學 1966 年開始教中文時，學生人數約有 20 個。80 年代初期一年級註冊新生約有 15 人，整個 80 年代學生人數隨著經濟起飛而增加，一直持續到 90 年代（1990-1991 年因天安門事件稍減，1992 年開始上升到 50-70 人）。近幾年來，教授中文的大學也隨著增加：從歷史上 19 世紀末在佛羅倫斯開設首堂的中文講座，到之後的拿波里、羅馬。多年來義大利漢學一直

是由拿波里、羅馬與威尼斯三個中心主導，這三所學校每年大約招收 100-120 個學生，威尼斯大學更是在上個世紀 70 年代末變得相當活躍。目前在全義 205 個高等教育機構中，約有 15 所提供中文課程，學生總人數約達 3,000 人。²⁷

蘭契奧蒂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威尼斯大學漢學研究興盛的歷史，²⁸ 該文清楚表達出現代義大利漢學研究的歷程與階段。由於早期實質參考書目短少的困難，想從事任何研究都不太可能（除了契尼基金會收藏的漢學研究作品外），而師資又不足，無法輔助教學活動。直到 70 年代初期，才開始推動學生赴中國進修的機會，後來也歸功於獎學金的發放，次數愈發頻繁。蘭契奧蒂見證了威尼斯大學藉著舉辦會議、研討會等活動，與歐洲及中國漢學中心都有許多學術接觸及交流。在其 1979 年返回拿波里時，留下一批運作良好的合作團隊，後來由薩巴蒂尼（Mario Sabattini）領頭，以熱情及諸多活動繼續推行有成，促進後續十年漢學研究興趣的復甦，而筆者也立刻被這股熱潮捲。

（二）義大利漢學相關研究的機構

義大利漢學研究的機構，首先是在漢學上執牛耳的三所大學，威尼斯、羅馬與拿波里，有大學、碩士、進修 Master 及博士課程。

威尼斯 Ca'Foscari 大學東亞學系（Dipartimento di Studi sull'Asia Orientale），屬於外語學院，目前分為兩個教學單位，分別開設「東亞語言文化」及「東亞語言經濟法律」的三年制大學課程，及兩年制碩士課程。在 1991 年前該系被稱為印度與遠東學系，開設中文、日文與印度語講座。90 年代初期，在 Treviso 分校又開設了「翻譯及口譯」大學課程及「技術科學翻譯」碩士課程。1966 至 1977 年中文系系主任為蘭契奧蒂教授，目前系主任則是由阿碧雅提（Magda Abbiati）教授擔任。

在羅馬 La Sapienza 大學東方研究學院（Facoltà di Studi Orientali）內，設有「東方語言及文明」大學及碩

27 資料來自中國駐羅馬大使館的教育處網站 <http://it.chineseembassy.org/ita/jylx/t141417.htm>，其中還提到目前約有 20 所中、小學教授中文。

28 L. Lanciotti, "Venezia ed il sorgere degli studi sinologici," in S. Perosa, M. Calderaro & S. Ragazzoni ed., *Venezia e le lingue e letterature straniere*, Roma, 1991, pp. 51-54.

士課程，必修兩種東方語言。該校頗以其悠久歷史自豪，1303年的教皇訓令中，教宗博尼法喬八世希望在羅馬市中心有個「學術中心」，授課內容能囊括知識的各類學門，很快的它成了歐洲東方研究之都。而中文教學從19世紀末（諾全提尼）就開始了，後來開中文講座課的有：瓦卡（至40年代）、德禮賢神父、Gabriella Molè、白佐良（1981至1996年），從1997年起則是馬西尼（Federico Masini）。1903年文學院內部成立東方研究系（Scuola Orientale），1954年成立東方高等研究所。1956年開始有外國語言文學大學課程，1960年東方學校三分而成立東亞與印度研究中心，後稱為東方研究系（Dipartimento di Studi Orientali, 1982），2001年改為東方研究學院（在義大利這是唯一如此命名的學院），院長是馬西尼教授。

拿波里東方大學（L' Orientale）過去稱為拿波里東方學院（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），其亞洲研究系（Dipartimento di Studi Asiatici）於1984年與各科系同時成立，取代先前彙整了東方考古學、阿拉伯與伊斯蘭語言文學、印度語言文學、伊朗語言文學、閃米族語言文學、漢學、土耳其學與日本學（Yamatologia）的亞洲研究課程（Seminario di Studi Asiatici）。

除了這些院校，近幾年又添了些其他學校，如杜林大學文哲學院東方學系、米蘭國立大學、米蘭 Bicocca 大學、波隆納大學東方與語言學研究系、羅馬第三大學、佩撒羅、佛羅倫斯大學、西耶那大學（康華倫教授）²⁹、萊切大學等，也許還有其他學校（在此為無心的省略義大利境內更多學校、更多教師而致歉）。

在漢學研究領域上，其他重要的義大利機構還有：義大利非洲與東方研究院（Istituto Italiano per l'Africa e l'Oriente, IsIAO（前 IsMEO））、契尼基金會（Fondazione Giorgio Cini）的威尼斯與東方研究所（Istituto Venezia e l'Oriente）、義大利漢學協會（Associazione Italiana per gli Studi Cinesi, A. I. S. C.）、國際亞洲高等研究所（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Asiatici Avanzati, CESMEO）、義大利中國友誼協會（Associazione Italia-Cina）、義中協會（Istituto Italo Cinese）及日本京都的義大利國立東方研究所（Scuola Italiana di Studi

sull'Asia Orientale, ISEAS）。

IsIAO於1995年由兩個在國際學術界聲譽卓著的單位所組成，一是義大利非洲研究所（IIA），一是義大利中遠東研究所（IsMEO）。IsMEO最早以學術文化機構成立於1933年，目的在拓展義大利與中東、遠東國家間的關係，並研究經濟問題；所長是金蒂勒（Giovanni Gentile），副所長是杜奇（Giuseppe Tucci, 1894-1984）。出版刊物有：《義大利中遠東學報》（1935）與《亞洲學報》（1936-1943），1950年創辦期刊《羅馬東方學叢書》（*Serie Orientale Roma*）及英文刊物 *East and West*，出版義大利及外國學者在歷史、哲學、語文學方面的研究。1951年重開東方語言課程（至今都是東方語言與文化的學習中心，期間是2到3年，可取得文憑）。期間發起新的探勘與考古挖掘（尼泊爾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伊朗），舉辦了令人嘆為觀止的東方藝術展，並開始積極從事修護工作，其中出土的多數文物，在羅馬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（Brancaccio）展示過。1978年Sabatino Moscati繼杜奇之後成為所長，1979年起又改由Gherardo Gnoli擔任。

由於該研究院對非洲與亞洲國家歷史遺產的重視，長久以來，其研究計畫都積極推動文化資產保存，從事非洲與東方文化遺跡的修護。1995年先在中國西安創辦了「文物保護修復培訓中心」，2004年依據「中意合作支持文物保護修復培訓項目」，進一步在北京中國文物研究所開辦培訓中心。IsIAO還跟多個義大利大學合作，與國外大學進行研究計畫、開設博士課程，以推廣對非洲和東方語言文學的研究。在IsIAO中還有東方學家學會、古阿拉伯協會及歐洲伊朗語言文學學會。IsIAO的本部設在羅馬，在米蘭、波隆納、京都都有分部，京都的稱為東方學研究所。

義大利國立東方學研究所（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, ISEAS）是由Silvio Vita教授主持，1984年成立，隸屬於東京義大利文化處（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），在IsIAO、義大利外交部、拿波里東方大學的合作支持下，從事重要的學術研究。該學校開放給各國學者及博士生，除了扮演聯繫義大利與日本機構、學者的功能外，也協助義大利研究員在日本作研究，並提

29 Valentino Castellazzi, 1982年威尼斯大學畢業，自1996年輔仁大學義大利語文學系創系至2002年擔任系主任。

供獎學金。

威尼斯與東方研究所位於契尼基金會內，成立於1958年，為基金會文化文明中心內的獨立部門，首要宗旨在推動印度與遠東文明的研究，在國際上頗受肯定及推崇。其圖書館最早是由漢學家白佐良負責管理，從創建初期就藏書豐富，頗有助於對中國、日本與印度的研究。曾購得國會圖書館攝製的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」微縮片的珍貴收藏；而80年代，又購得一套道藏經典（約有1,500部）。1984年舉辦了「道家研究領域之國際合作」國際研討會，會中提出由歐洲科學基金會資助的「道藏計畫」。同年也舉辦以「威尼斯與東方」為題的第25屆國際高等文化課程，該機構也發行自己的《威尼斯東方學叢書》（*Orientalia Venetiana*）。

1999年夏天，該所與威尼斯大學東亞學系、馬可波羅亞洲研究中心及20世紀中國歷史學會合作，舉辦了「20世紀民國時期的角色：反思與再思」國際研討會，旨在釐清1912-1949年這段史學上頗具爭議的時期，近二十來由於不少中國歷史檔案的開放，越來越多的討論都以這個階段為對象。威尼斯與東方研究所的主任，目前是卡多納教授。

另外，還有義大利漢學協會、³⁰義中商會（Camera di Commercio Italo-Cinese）、³¹義大利中國友誼協會（Associazione Italia-Cina）、³²亞洲高等研究所（CESMEO）等。

（三）知名的學者及其傑出著作簡介

東方研究大師杜奇，其古典文學造詣深厚，精通多種語言（十來種歐語、梵文、中文與藏文），是記者、

作家、西藏學家、考古學家、人類學家、探險家；曾在兩所印度大學教授義文、中文與藏文，還與甘地及泰戈爾見過面。1930年起在拿波里教中文，1932年起在羅馬大學教遠東宗教與哲學。他不自限於書本上的知識，曾在喜馬拉雅這個亞洲多種文化匯集的廣大區域，進行8次探險，戰後又在 IsMEO 成立探勘中心，並於1948至1978年間擔任所長。1950年創辦知名的英文期刊 *East and West*，1957年成立羅馬國立東方藝術博物館。他的著作中包含了無數佛教與密宗的研究：《印度與西藏》（1932-1942）7冊、《西藏畫卷》2冊（1949）及印度哲學史（1957）。他在羅馬大學的學生有：Mario Bussagli 及 Luciano Petech。³³

在義大利主要的漢學家中，理應給白佐良教授一個特別地位。「教授」（所有的學生都如此稱呼他）1923年1月26日出生於羅馬，少年時就展現出對語言的天分，不論是古典或現代語言；除了希臘文和拉丁文外，他也學習法文、英文、德文，甚至16歲時就在 IsMEO 學習中文，於1942年取得文憑。儘管如此，他接受了父親的建議攻讀法學，才22歲就以國際法的論文取得碩士。大學就讀期間，他與當時主持中文講座的瓦卡教授開始來往，畢業之後他到拿波里東方學院教中文，也在羅馬大學擔任東亞史地的義務助教。不過他很快就放下學術生涯而轉向外交領域，在1945年底他把握機會，結合他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熱愛以及家人的期盼，開展外交生涯。於是1946年11月1日，他隨義大利大使芬諾提（Sergio Fenoaltea）上船，接任義大利南京大使館駐外特等翻譯。一直到1950年8月，由於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，大使館必須關閉並焚毀檔案資料，「教授」只

30 1979年設立在契尼基金會內，以推展促進中國研究及中國文明相關的學術活動。其第十屆的全國大會在2005年3月於威尼斯召開，題目是「過去與現在之間的中國文明歷程」。

31 義中商會是商場人士自由加入的協會，1970年10月16日誕生，目的在拓展義大利與中國間經濟商業關係的發展。跟本會息息相關的是義中協會（Istituto Italo-Cinese），在米蘭和杜林常舉辦各式文化課程與活動，也有開設「漢語水平考試」的準備課程。它發行的季刊《中國世界》（*Mondo Cinese*），被文化資產部評為具有高度文化價值。

32 是義大利第一個開中文課的民間機構（1970年），目前以三年一期的課程為基礎，1984年起也成為漢語水平考試考場。其教學服務中心不但從事出版活動，提供訂閱數百種中文或世界上其他語言報紙與雜誌的服務，更舉辦會議、辯論、研討會、講座、展覽、電影及視聽播放、中國旅遊、參觀訪問團等。值得一提的還有期刊《友誼會刊》，收錄了義大利最優秀的漢學家們之文章。

33 1923至1948年由瓦卡任教，從1948至1984年由Petech任教，最後由科拉迪尼（Piero Corradini）與Paolo Daffinà繼任，分別教授印度及中亞藝術史、遠東藝術史及東亞史地。

得坐火車長途跋涉到香港，才得以出境回到祖國。居留在南京的那幾年，受到一位後來結為連理的中國千金嚴格督導，對於其書面及口語中文的深入學習與能力提升有重要意義。1952年通過外交人員考試後，他以副領事的身分回到香港，隔年9月升為領事。往後的七年任期中，他得以認識重要的中國文人，並閱覽香港豐富的圖書典藏，由此蒐集資料寫成首部大作《中國文學史》，³⁴深受國際學者如 Paul Demieville 等讚譽。1968年1月他受聘為拿波里東方學院的教授，但在5個月後又再次受命擔任外交部職務，成為政治事務司第五科科長，由此緣故，他在完全保密的狀況下，被派遣到巴黎參與外交協議，這些會談促成1969年中義重新建立外交關係。

1981年開始，由於他通過羅馬 La Sapienza 大學中文講座徵選，他將最後20年充實的人生投注於兩件事，一為個人學識的傳播，；另一為繁忙的學術研究，除了上百篇論文和百科條目外，他也孜孜不倦地發表了為數眾多的書籍，主題從道家思想、中國古典及白話文學，到17-18世紀間義大利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。

白教授精通多國語言，除了希、拉、法、英、德、中、日文外，他也懂俄文，以及其他在外交生涯中所派駐的當地語言。他擁有驚人的記憶力，並以隨口朗誦詩文的能力出名（包括希臘文與拉丁文經典、義大利或外國文學篇章以及中文典籍，他也一直對學生如此要求）。總歸來說，他的一生十分不凡，不但具有天賦也擁有深厚的人文素養。

蘭契奧蒂 1925年生於羅馬，由德禮賢神父指導撰寫中國語言文學的畢業論文。1949年到1950年在斯德哥爾摩跟隨 Bernard Karlgren 學中文，1951年在荷蘭萊頓大學師事 Duyvendak 教授。1960年起為羅馬的中文委

任教授，1966至1979年為威尼斯正教授。1979年調到拿波里大學，重開中文文字學講座直到1997年，隔年起成為榮譽教授。1974到2002年主持威尼斯與東方研究所，辦過六場有關中國的國際研討會。從義大利漢學協會（A. I. S. C.）1979年創立以來，就擔任秘書長。他擔任 IsIAO 的董事，也在杜奇所創辦的《東方與西方》擔任聯合主編，至今已編輯了30冊《中國》叢書。1998年起主持 IsIAO 的義大利東方研究學會（Società Italiana degli Orientalisti）與亞洲辭典編纂中心（Centro di Lessicografia Asiatica）。他的著作（包括評論與譯自中文的書冊）有150多種，其研究領域以中國文學、哲學與宗教方面為主。1984年《威尼斯東方學叢書》出了一本《蘭契奧蒂紀念專冊》，³⁵1996年也有三本紀念蘭契奧蒂研究的專書付梓。³⁶

薩巴蒂尼（Mario Sabattini, 1944-）威尼斯 Ca' Foscari 大學中國語文正教授。曾任威尼斯大學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、東方語文學門主任、印度遠東學系系主任、外語學院院長、代理副校長等職，1988-1999年擔任義大利漢學研究協會秘書長，1992-1995年又由高等教育部任命為 IsMEO 董事。他在1999-2003年為義大利駐北京大使館文化處處長，由於他促進中義文化交流的貢獻，於2003年獲中國政府頒發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。

他的研究範疇，包含與古代及現代中國發展史相關的議題，也分析過當代中國美學思想與古典傳統及西方影響的關係，尤其重視將義大利哲學家克羅其引入中國的朱光潛，³⁷他討論這個主題的幾篇文章，在中國與臺灣都出版過。³⁸其研究過中國敘事文學的發展，³⁹也首開中文泰文關係的比較研究。

34 *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cinese*, 1959 年米蘭 Nuova Accademia 出版，1968 年由 Sansoni Accademia 重新印行。

35 Volume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, 佛羅倫斯 Olschki 出版。

36 由 S. M. Carletti、M. Sacchetti 與史華羅主編，並由拿波里大學與 IsMEO、羅馬、威尼斯大學發行。

37 “‘Crocianism’ in Chu Kuang-ch’ien’s ‘Wen-i hsin-li-hsüeh,’” in *East and West*, New Series, vol. 20, n.1-2, March-June 1970; “Croce e Zhu Guangqian,” in *Lettere italiane*, n. 4, 1983; *The Aesthetic Thought of Zhu Guangqian*, Roma, 1984; “Chu Kuang-ch’ien and Croce,” in *Tamkang Review*, vol. XXIII, n. 1-2-3-4, Autumn 1992-Summer 1993.

38 〈外國學者論朱光潛與克羅其美學〉，《讀書》n. 3, 1981；〈論朱光潛先生對於建立新價值體系的貢獻〉，《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下冊，臺北：漢學研究中心，1992。

39 《漆之筆——從明朝至當代的中國敘事文學》（*Il pennello di lacca. La narrativa cinese dalla dinastia Ming ai giorni nostri*），與史華羅合編，Roma 及 Bari, 1997；主編郁達夫小說選《采石磯》（*La roccia dipinta*），威尼斯，1999。

另有義大利漢學家，如史華羅（Paolo Santangelo）⁴⁰、史卡帕利（Maurizio Scarpari）⁴¹、阿碧雅提（Magda Abbiati）⁴²、史達禮（Giovanni Stary）⁴³、馬西尼（Federico Masini）⁴⁴、卡薩加（Giorgio Casacchia）⁴⁵、薩瑪拉尼（Guido Samarani）⁴⁶等，而在國外也還有一些義大利漢學家。⁴⁷

（四）著作名單：目前漢學相關研究的動機及其發展趨勢

漢學家有興趣的研究主題，現在可說越來越廣了。從早期傳教式漢學僅限於對語言、孔子的教義、中國的

歷史、地理，到後來很快又擴展到文學（晁德蒞）以及白話文學（安德羅齊、威達雷）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要感謝耶穌會德禮賢神父研究利瑪竇的作品《中國地圖與利氏文集》，其後有《中國文選》，還有 Alberto Castellani（《論語》、《道德經》及少許詩作）與 Gabriele Allegra（屈原《離騷》）散亂沒有系統的翻譯。⁴⁸

爲了能更有系統地介紹漢學，我們必須從白佐良教授創立現代義大利漢學研究談起，他 1946 年至 1950 年間住在中國；1945 年起他開始出版特別是文學方面的作品，其《中國文學史》可謂集大成之作，從《詩經》到現代文學，都收錄在這本歐洲漢學巨著中。另一本談論

40 拿波里東方學院的中國史教授，在羅馬 La Sapienza 大學東方研究學院兼任東亞史課程。曾任義大利漢學研究協會及歐洲漢學學會理事，1992 年起主編東亞近代與現代研究的年刊《明清研究》，最主要的成果是發表《中國史中的感性教育——明清文獻的跨學科研究》一書。

41 威尼斯大學教授，個人專書與論文著作無數，這些都是他針對中國前漢時期的研究成果，而他的研究主要採取語史學、考古學、古代哲學思想史的觀點。他的教學活動以中國古典（西元前四至二世紀）哲學作品及語言爲主。

42 威尼斯大學東亞研究系主任，她的興趣在中國語言：句法學、語意學、語用學、特殊語言及象徵語言，教學內容則著重在現代中國語言文法。

43 威尼斯大學蒙古語言文學的教授，1999/2000 學年度起，主講滿州語言文學課程。他的興趣，主要在古代或現代的本地滿州文學、從文獻中看滿州薩滿教、前清時期滿人形成史，從他們移入新疆（18 世紀）直到今日。

44 羅馬東方研究學院院長。豐富的著作反映出他的研究興趣：語言學（現代中文）、詞彙研究、義中關係史（與白佐良合著《義大利與中國》一書，此書也有中文翻譯），以及《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——19 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（1840-1898）》（本書翻譯爲中、日、英、韓文）。

45 拿波里東方學中國語文學教授。他的研究領域主要分爲三個面向：一是漢語語言學，包含現代中文的文法，以及語言、方言及文法的演變歷史研究；二是文言及白話的古典文學，包括將馮夢龍與凌濛初等人的作品翻譯成義大利文；三是辭典學，其編纂的漢義大辭典收錄約十萬個詞條（預計將於 2007 前半年問世）。

46 是威尼斯大學東亞歷史制度課的臨時教授，著作等身，皆是他研究及參與多項國內外研討會的成果，如《中俄關係及義大利對中國的政策（1912-1928）》，「莫斯科、廣州、北京：蘇聯與中國的早期關係」國際研討會，這些會議主題以 20 世紀中國歷史爲主。

47 在國外的義大利漢學家則有：Nicola Di Cosmo 任教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歷史研究所，研究興趣爲滿蒙、中亞史、亞洲歷史的邊界關係；Paola De Mattè 任教於美國羅德島設計學校中國藝術史系，研究興趣爲中國考古學、楚國、中國文字起源、史前岩壁藝術、東西方接觸及中國耶穌會士等訓練等；Giovanni Vitiello 教於夏威夷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，作過傳統中文敘述與帝國晚期情色史的研究；Margherita Zanasi 任教於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歷史系，興趣在中國現代史、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、經濟思想。Eugenio Menegon 爲波士頓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，研究興趣在中國 17 與 18 世紀的傳教、中國的多明尼加會士、福建省的天主教教會；Paola Zamperini 任教於美國麻塞諸塞州 Amherst 學院亞洲語言文明系，其主要研究領域爲中國的女性研究；Fabio Lanza 爲亞利桑納土桑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現代中國歷史，主要研究領域爲現代中國文化及知識份子的歷史，尤其是 20 世紀的學生運動歷史。

48 參見 Federico Masini，「中國文學義大利翻譯」，發表於 1994 年 5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校主辦的「中文歐洲語言翻譯」研討會。目前收於 Viviane Alleton & Michael Lackner ed. *De l'un au multiple, Traductions du chinois vers les langues européennes. Traductions from Chinese into European languages.* (Paris: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'homme, 1999) pp. 33-57。

白話文學的《中國文學史》(*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cinese*)由蘭契奧蒂於1969年出版,其中廣泛地收錄白話文學的翻譯。而1970年羅馬大學的東亞史教授科拉迪尼也發行了《中國文學史》(*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cinese*)以及《中國文學選集》(*Antologia della letteratura cinese*)。Martin Benedikter也先出過《唐詩三百首》(*Trecento poesie Tang*)選集,在1961年才又出版全集。在這個文學萌芽時期,敘事文學也佔了一席之地:1955年蘭契奧蒂翻譯並評論沈復的《浮生六記》(*Sei racconti di vita irreali*),而Ludovico Antonio Di Giura則是譯了蒲松齡全版完整的《聊齋誌異》(*I racconti fantastici di Liao*),1964年Edoardo Masi又翻譯了《紅樓夢》(*I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*)。從其他西方語言再譯的作品仍繼續著:有金瓶梅(1955)、水滸傳(1956)及西遊記(1960)。1965年Primerose Gigliesi直接從中文翻譯魯迅的短篇小說〈奔月〉,以及另一冊魯迅、巴金、茅盾等的短篇作品。在70與80年代,1949年之前中國主要作家的長篇或短篇文學作品,翻譯的數量都持續發展,而古典文學作品亦然(如Fausto Tomassini的《儒家典籍》、《道家典籍》、《孔子》、《春秋》等),散文文學除了白佐良的《龍圖公案》外,還有卡薩加的《話本》(*Apparizioni d'Oriente. Novelle cinesi del Medioevo*)、《三十六計》與史華羅的《猴王夢》(*Il sogno dello scimmiotto*)及其他明清傳奇。在此無法一一列舉。從80年代起,文化大革命後現代、當代文學還有「異議文學」的眾多翻譯與研究作品,如《阿城三部曲》(Maria Rita Masci譯)與《王蒙》(Fiorenzo La Firenze譯)。要知道更詳盡的書目,可參閱Francesco D'Arelli的著作《中國研究在義大利——1899-1999年書目整理》(*La Cina in Italia. Una bibliografia dal 1899 al 1999*, 威尼斯 Cafoscarina, 即將出版)。

除了漢學家熱中研究的文學主流外,出身主要大學的新一代漢學家,也積極推動語言及語文學的研究,因而出了不少論述古典中文或現代中文的語言學文章與作品、論甲骨文的古辭典、中古中文、新聞用語與新辭字典、編現代中文大字典的計畫、西元前四到二世紀中文手抄本的研究、從明清傳奇研究中國物質文明、當代中國文學翻譯之敘事時態處理問題。

在歷史方面,值得一提的,有科拉迪尼的《中國

史》與中國從遠古到帝制滅亡的歷史,另有許多關於末代皇朝、現代史、政治運動的研究,及論兩次大戰期間社會經濟發展、中國民族主義、日本對中國政治思想演進的影響、國民黨歷史問題的文章。英文作品則有Gabriella Molè的《從北魏到五代的吐玉瑋》或Luciano Pechet的《亞洲史選文》。史達禮有關滿文歷史、語言及文化與薩滿教的作品,同樣不勝枚舉,且以不同語言皆有出版。

在中國宗教哲學方面,作品亦具代表性。從儒家思想、到論中國帝國時期的罪惡、慾望、誘惑與熱情。從30年代一直到二次戰後,佛教都是知名東方學者杜奇與Antonio Forte的研究對象。道教則被白佐良、蘭契奧蒂、卡多納、Fabrizio Pregadio研究過,美學觀則是薩巴提尼的研究,史達禮則研究清朝的薩滿教。還有P. Beonio-Brocchieri 1977年出的《中國與東亞哲學》。

中國考古與藝術史方面,一直有許多重要展覽,IsIAO(前IsMEO)一直以來持續進行相關研究,在美國任教的Paola De Mattè也是重要學者。在中國科學史上,Adolfo Tamburello曾在拿波里做過古天文學的研究,F. Pregadio則研究中國煉金術。白佐良、馬西尼、李琵琶、Francesco D'Arelli等都做過中國天主教傳教士史及義中關係的研究。

期刊當中,我們當然得舉出三個漢學研究重鎮:羅馬大學的《東亞研究期刊》(*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*),威尼斯大學的《Ca'Foscari 東方年鑑》,現更名爲《威尼西亞洲研究》(*Asiatica Veneziana*),以及拿波里的《東方學院年鑑》(*Annali dell'Istituto Orientale*)。

此外,IsMEO(現稱IsIAO)出版的*East and West*,是以英語發行的季刊,由杜奇在1950年創刊,以特殊觀點探討藝術、考古、歷史、語文學、文學、哲學與宗教;在它之前有《亞洲期刊》(*Asiatica*) (1936-1943),本是IsMEO的會訊,以記載義大利在東方的文化活動新聞,並報導義大利的東方研究,不過很快就成了純學術性期刊,自1958年《新叢刊》(*Nuova Serie*)發行後,其特色更是明白確立。

在IsIAO還有發行《中國》年刊,由蘭契奧蒂編輯,創刊於1956年,旨在研究當代中國的思想、藝術、科學與組織,但也兼顧中國傳統研究,另有史華羅編輯、與拿波里東方學院合作出版的《明清研究》(*Ming-Qing Yanjiu*)年刊。

義中協會的期刊是《中國世界》(Mondo Cinese)，義大利中國友誼協會則發行《友誼會刊》(Quaderni dell'Amicizia)，當中收錄義大利漢學界於每一年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。至於叢書的出版中，我們要提的是契尼基金會基金會之威尼斯與東方學院所發行的《威尼斯東方學叢書》(Orientalia Venetiana)，這是由卡多納教授協調、Leo S. Olschki Editore 出版社在佛羅倫斯所出版；還有史卡帕利教授為威尼斯 Cafoscarina 出版社所編的《中國與東方》(Cina e altri orienti)。

四、後記

在此致上最高的敬意與最深的感激之情，給此文中所提到的所有漢學家，從過去到當代，儘管困難重重，他們都得以成功開展並維持一場跨文化的對談（當今此種對談更顯必要），引發並孕育對於如此豐富的文化、如此遙遠而陌生的年代之熱切嚮往。其成果即為當下諸多漢學科系於義大利各城興盛繁榮，進而填補兩個文化相互認識的需求。唯有相互認識，在現今前所未有的小世界，才能衍生和平共處所必需的敬愛與尊重。

儘管拜現代科技之賜，各種距離大為縮短，要取得涵蓋義大利漢學研究全貌所需的資訊，仍非易事；即使我們明白：義大利和西方的漢學，因為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益發重要，正處於欣欣向榮的時期。在此同時，謹對所有無心省略之處致上歉意；並再次承諾，會將此版中多半於 2004 年更新的資料，儘快翻新撰寫成新一版本。

附錄：

(一) 義大利漢學研究的參考書目

1. Aggiunte apportate da G. Bertuccioli, *Per una storia della sinologia italiana: prime note su alcuni sinologi e interpreti di cinese* (義大利漢學歷史——最早關於傳教士與中文口譯員的紀事), *Mondo Cinese*, n. 74, 1991, pp. 9-39.
2. Francesco D'Arelli, *La Cina in Italia. Una bibliografia dal 1899 al 1999* (義大利中國研究——1899-1999 年書目整理), Venezia, Cafoscarina. (即將出版)
3. G. Gabrieli, *Bibliografia degli scritti orientalisti-*

ci in Italia dal 1912 al 1934 (義大利東亞研究著作書目——1912-1934 年), in *Lingue e letterature dell'Estremo Oriente*, Roma, 1935, pp. 144-152.

4. G. Vacca, *Asia Orientale in Gli studi orientalistici in Italia negli ultimi cinquant'anni 1861 al 1911* (義大利 1861-1911 近五十年的東方研究——東亞), *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*, Vol. V, 1913-1917, pp. 274-390.
5. G. Vacca, *Il contributo italiano agli studi nel campo delle lingue e letterature dell'Estremo Oriente negli ultimi cento anni* (1839-1939 百年來義大利對遠東語文領域的研究貢獻), *Un secolo di progresso scientifico italiano 1839-1939*, Roma, 1939, pp. 172-187.
6. G. Vitiello, *Bibliografia sinologica italiana* (1959-1987) (義大利漢學研究書目——1958-1987 年), Associazione Italiana per gli Studi Cinesi (AISC), Roma, 1988, pp. 5-85.
7. L. Lanciotti, *Contributo italiano alla conoscenza dell'Oriente-Repertorio bibliografico dal 1935 al 1958* (義大利對瞭解東方之貢獻——1935-1958 年的書目索引), Firenze, 1962, pp. 237-254.

(二) 其他參考書目

1. *Europe Studies China: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*. London: Han-shang Tang Books, 1995, p. 569 (在臺北舉行的歐洲漢學史國際研討會專刊，蔣經國基金會主辦，1992 年 4 月 17-20 日)。
2. Viviane Alleton & Michael Lackner eds., *De l'un au multiple, Traductions du chinois vers les langues européennes*. (歐洲語言翻譯中文研討會專刊) Paris: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'homme, 1999.
3. G. Bertuccioli, F. Masini, *Italia e Cina* (義大利與中國), Roma-Bari, 1996.

(三) 關於拿波里中國學院

1. Michele Fatica, *L'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 come sede di scambio culturale tra Cina e Italia nei secoli XVIII e XIX* (拿波里東方學院作為 18、19 世紀中義文化交流所在), *Scritture di storia*, Quaderno n. 2-maggio 2001,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, pp. 83-121.
2. Michele Fatica, "Per una mostra fotografica ed iconografica su Matteo Ripa, il Collegio dei Cinesi e il Real Collegio asiatico (1682-1888)" (馮國賢、中國學院與皇家亞洲學院攝影圖像展專文), *La missione cattolica in Cina tra i secoli XVIII-XIX,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*, Napoli, 1999, pp. 1-38.